



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
《新疆通史》研究丛书

《新疆通史》编撰委员会◎编

汉唐于阗佛教研究

广中智之◎著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《新疆通史》编撰委员会◎编

汉唐于阗佛教研究

广中智之◎著
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汉唐于阗佛教研究/广中智之著.—乌鲁木齐:新疆人民出版社,2012.9

(《新疆通史》研究丛书)

ISBN 978-7-228-15968-0

I.①汉… II.①广… III.①于阗—佛教—研究—汉代②于阗—佛教—研究—唐代 IV.①B94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27715 号

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
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
邮 编 830001
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
制 作 乌鲁木齐捷迅彩艺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 乌鲁木齐科恒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92 1/16
印 张 14.75
字 数 250 千字
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~3000 册
定 价 38.00 元

前 言

新疆古称西域,地处祖国西北边陲、亚欧大陆的腹地。历史上,这里曾经是中西陆路交通的主要通道,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,就是一个多元文化、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。从公元前59年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时起,新疆就划入了汉朝的版图,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为了全面、深入、正确地阐明新疆历史,包括各民族的发展史和宗教演变的历史,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,2005年初,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批准,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立项,决定编写多卷本的《新疆通史》,并成立了《新疆通史》编撰委员会。按照计划,《新疆通史》项目包括三部分,或称三大工程,即主题工程、基础工程和辅助工程。其中,辅助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,就是组织一部分专家、学者对新疆历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做进一步深入研究,为《新疆通史》的编写工作提供参考,同时提高人们对新疆历史的整体认识和研究水平。

近代以来,在新疆广袤的土地上陆续发现了大批地古文化遗址,出土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,极大地充实了中国历史内涵,新疆历史研究因此广受社会各界的关注。一百多年以来,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,学术界对新疆历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,硕果累累,为《新疆通史》的编写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。《新疆通史》的立项,再一次为新疆历史研究的进一

步深入,提供了新的契机。我们希望,通过编撰《新疆通史》,能够出版一批包括《新疆通史》主体工程在内的学术精品,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新疆历史搭建一个新的平台,造就一批政治上强、业务素质高、有良好职业道德的各民族专家、学者。

《新疆通史》编撰委员会成立以来,我们已经邀请一些专家、学者,配合《新疆通史》的编写工作,对新疆历史上的重要问题进行专题研究,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。经过认真审核和甄选,我们现将其中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,作为《新疆通史》项目研究丛书公开出版,以供大家参考。

鉴于我们的水平,所选著作中可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不足,欢迎大家批评指正,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!

《新疆通史》编撰委员会

序

序

1999年,广中智之君带着池田温和加藤九祚两位先生的推荐信来找我求学,池田先生是东京大学教授,与我非常熟悉;加藤先生的名字早已在很多书上见到过,是中亚考古的专家,特别对前苏联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了如指掌。虽然对广中君不是那么了解,但有这么两位大专家的推荐,我毫不犹豫地就接受他来读我的博士生了。听北大研究生院的老师讲,虽然有很多日本学生来进修,真正来读北大的博士生的并不多,所以他们也非常欢迎广中来北大学习。

广中君的目的很明确,要研究于阗佛教,他一定是看了张广达先生和我合著过《于阗史丛考》而来的。其实,我是一个历史学者,对于于阗佛教的讨论都是从历史的视角来进行的;而广中君来自日本的佛教大学,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做得更加深入。佛教是于阗研究的重中之重,他能来做这项研究,也是我本心所热切期待的事情。

汉唐之间的于阗,是西域南道的大国,也是大乘佛教的学术与传播中心,中原盛行的大乘佛教有不少经典或思想就来自于阗,从三国时曹魏的朱世行,到唐朝的实叉难陀,有的去取经,有的来传法,都给中原的大乘佛教不断灌输着新的思想,带来新的学说。从龟兹、焉耆、高昌发现的胡语佛典,如《赞巴斯塔书》,也表明于阗佛教对西域北道各国产生的影响。藏文大藏经中保留了数部有关于阗的预言类佛典,多部西藏佛教史中都用一定的篇幅来讲于阗的佛法流行,敦煌保存的汉藏文佛典说于阗佛法灭尽之

后,佛教僧侣的出路是吐蕃的赤面国。这些在在地说明于阗佛教的伟大和影响深远。

然而,于阗佛教的研究并非易事,因为除了传世的汉文、藏文文献外,还有从19世纪末以来当地陆续出土的大量梵文、于阗文、汉文、藏文的佛典残片,这些残片经过一个世纪东西方学者的研究,大多已经解读、比定出来,但有关研究文献是用各种语言所写,而且收集不易,阅读也不那么简单。

广中君不畏艰难,也利用可以在中国、日本各学术单位自由游走的条件,耐心细致地收集资料,以日本学者传统的细腻做法,巨细不遗,竭泽而渔,几乎把有关于于阗佛教研究的的东西方文献网罗殆尽,包括过去我不太能够充分掌握的俄文研究论著,读者只要看看书后所附《研究文献目录》,就可以看出作者用功之勤。

在完整掌握已知传统文献和出土写本的基础上,广中君大致依年代顺序,详细描述了汉唐间于阗佛教历史和佛教文献的整体面貌。我在阅读他的博士论文的时候,时常感到他的描述极其仔细,但推论不多,有时建议他是否能有所展开,但他并没有接受我的建议。我想这正是广中君的真实想法和行文风格,他有着佛教圣徒般的虔诚,有着佛教的施舍精神,他希望自己所做的工作是给今后的学者铺路,他自己只是用苦行的方法给别人做前行的路石。

现在看到这部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增补而成的《汉唐于阗佛教研究——以传世文献和出土写本为中心》,我由衷地感到高兴,因述与本书相关的学术因缘如上,是为序。

荣新江

2012年8月21日

于乌鲁木齐

目 录

序 荣新江 / 001

导 论 / 001

一、小 引 / 001

二、于阗佛教研究之传统材料 / 002

1. 汉文史籍 / 002

2. 藏文文献 / 003

3. 敦煌文书 / 005

三、和田出土佛经写本 / 006

1. 考古发现经过与所在地概观 / 006

2. 梵文佛典 / 017

3. 于阗文佛典(部分包括敦煌文书) / 018

四、于阗佛教研究回顾 / 021

五、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/ 024

1. 羽溪了諦《西域之佛教》的问题 / 024

2. 佛教的中亚化与大乘佛典成立之问题 / 030

小 引 / 034

第一章 佛教传入于阗的传说与史实 / 035

- 第一节 于阗建国传说 / 035
- 第二节 佛教传入于阗的传说 / 045
- 第三节 犍陀罗语《法句经》及其意义 / 052

第二章 于阗的佛典传译与中原的西行求法 / 057

- 第一节 朱士行西行求法与于阗出土的大小乘文献 / 058
- 第二节 行像、传法与讲经——法显等人所记的于阗佛教 / 066
- 第三节 佛牙与《法华经》——法献在于阗的收获 / 076
- 第四节 于阗瑞像与葬俗——宋云所记佛教对于阗的影响 / 090
- 第五节 简论梵文佛典的流行和于阗语的翻译 / 099
- 第六节 于阗人自己编纂的佛典——《赞巴斯塔书》 / 115

第三章 于阗与隋唐朝的佛教交流与相互贡献 / 120

- 第一节 于阗与隋朝佛教——以大兴善寺为中心 / 121
- 第二节 玄奘逗留于阗的意义 / 126
- 第三节 长安的尉迟氏王族对唐朝佛教的贡献 / 131
- 第四节 武则天与于阗《华严》新思想的传入 / 135
- 第五节 慧超所见于阗大乘佛教的戒律 / 144
- 第六节 于阗佛教在西域的影响——悟空和赵彦宾的记录 / 158

结 语 / 163

研究文献目录 (Selected Bibliography) / 164

缩略语 (Abbreviations) / 217

后 记 / 224

导 论

一、小 引

佛教从印度向中国的传播是和西域分不开的,而于阗是西域南道的最大王国,尤其于阗是在中国最为盛行的大乘佛教的传播中心,因此,研究于阗的佛教史,其意义不仅在于澄清于阗历史本身的一些问题,更为重要的是可以通过于阗佛教史的探讨,弄清中国佛教的一些源流问题。

西域南道之中心于阗,现在所知,最初居住的塞人。后来佛教传入,在经历了中原王朝的经营、吐蕃的占领和回鹘的渗透等等历史时期之后,到11世纪初,信奉伊斯兰教的喀拉汗王朝打败并吞并了于阗王国,至此,于阗佛教已经拥有了一千年的历史。由于于阗经历了这种种历史变故,记录于阗历史的资料也呈现出多样与复杂的状况。作为历史资料,特别是于阗语这种“死语言”的转写、解读,以及佛典的比定和翻译工作都极有难度。虽然19世纪末以来不断地发现这种新资料,但是,同时也导致珍贵研究材料的分散,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便。如今,情况虽然在慢慢地好转,即使依然有些问题尚待今后的研究,但是语言学者的研究成果毕竟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。与此同时,于阗考古方面也有了一些新的进展。这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便利。

为了本文后面的进一步的讨论,先简单地归纳前人的研究成果,而简

明扼要地介绍一些重要的研究资料,特别是和田地区^①出土的佛教写本。笔者本人是语言学外行,但这种整理工作还是有一定的价值^②。在讨论传统史料的时候,正文中还将提到这些出土写本。此外,佛教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很有积累,为我们讨论于阗佛教史提供了很大的帮助,尤其是大乘佛教和大乘佛经的研究。讨论的时间为佛教传入于阗至唐代前期,吐蕃占领于阗以后从略。

因为涉及的文献甚多,笔者难免遗漏与错误,不当之处,敬请指正。

二、于阗佛教研究之传统材料^③

1. 汉文史籍

过去研究于阗佛教史,主要的资料是汉藏文的传统文献。而最基本的史料,还是汉文传世史籍和佛教典籍,如汉文正史中的西域传、僧传、行记、画史等。相对而言,汉文正史西域传中的有关佛教的信息并不多,但是,因为研究于阗佛教的时候对当时的历史背景的把握十分重要,这些有明确年代标志的文献就具有了关键的意义。为我们提供更为直接的关于阗佛教的信息的是僧传和行记,特别是如玄奘那样的西行求法僧留下来的记录。现在,《法显传》、《宋云行纪》、《大唐西域记》等资料的版本、翻译、注释乃至研究都很有积累。此外,《历代名画记》等画史中有于阗出身的尉迟画

* 关于缩略语,请看缩略语表。另外,为了避免繁杂,下面注释中基本上忽略相关翻译或书评等消息,关于这类文献,请看后面“研究文献目录”。

① 这里我所说的“和田地区”,基本上相当于于阗语文书出土的古代于阗国的范围,而不包括属于精绝或楼兰王国时代的尼雅、克里雅等地。其实,近年这二地的考古发掘工作确实也有突破。

② 汤山明先生强调“事倍功半”的文献目录学(Bibliographical Study)的工作的必要。见 A. Yuyama, “The Need for Systematic Bibliographies in Buddhist Sanskrit Philology”, *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* V. 2, 1972, 339-346。

③ 关于整个于阗古代史的研究史料的概述,见张广达、荣新江《和田、敦煌发现的中古于阗史料概述》,原载《新疆社会科学》1983年第4期;收入作者《于阗史丛考(增订本)》,1-14页。

派在两京寺院里绘画的信息,也是重要的研究资料。我们先还得依靠这些传统文献资料,来论述于阗佛教史。

因为中原佛教一直受到于阗佛教的巨大影响,所以中国佛教史的著作也经常提到于阗佛教,如中国有汤用彤先生(1893-1964)的著作^①、吕澂先生的《中国佛学源流略讲》^②、任继愈先生主编的《中国佛教史》^③;日本镰田茂雄《中国佛教史》^④;欧美有许里和(Erik Zürcher)《佛教征服中国》^⑤、陈观胜(Kenneth K. S. Ch'en)的著作等^⑥。这些著作都主要是利用求法西行僧人的记载^⑦,来研究于阗佛教的情况。

2. 藏文文献

藏文文献的《于阗国授记》等也包括有关于于阗佛教的信息。虽然这些文献有浓厚的传说性色彩,但是,与玄奘留下来的见闻有很多共同点,对研究于阗佛教史还是有很大的帮助^⑧,这些资料主要有:(-)《于阗国授记》(Li

① 汤用彤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,中华书局,1963年(初版:商务印书馆,1938年);同作者《隋唐佛教史稿》,中华书局,1982年。

② 吕澂《中国佛学源流略讲》,中华书局,1979年。

③ 任继愈主编《中国佛教史》第1-2卷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80-1985年。

④ 镰田茂雄《中国佛教史》共6卷,东京大学出版社,1982-1999年。

⑤ E. Zürcher, *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*, 2 vols., Leiden 1959.

⑥ K. K. S. Ch'en, *Buddhism in China. A Historical Survey*, Princeton 1964.

⑦ 参见É. Chavannes, *Les voyageurs chinois, extrait des guides madrolle. Chine du Sud*, Paris 1904(冯承钧中译《中国之旅行家》,商务印书馆,1926年;此书收入《译丛八编》,3-42页);《西域之佛教》第一章《绪论》,3-78页(中译,5-44页)。矶部信孝《求法僧の旅行记に見られる中央アジアの佛教》,《佛教史研究》第17号,1983年,49-85页。

⑧ G. Uray, "The Tibetan Sources of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up to 751 A. D. : A Survey", *Prolegomena*, 288-290;巴桑旺堆《藏文文献中的若干于阗史料》,《敦煌学辑刊》1986年第1期,69-73页。

yul lun-bstan-pa)^①、(二)《牛角山授记》(*Ri-Glang-ru lun-bstan-pa*)^②、(三)《僧伽伐弹那授记》(*Dgra-bcom-pa Dge-'dun' phei-gyis lun-bstan-pa*)^③、(四)《于阗阿罗汉授记》(*Li yul gyi dgra-bcom-pas lun-bstan-pa*)^④、(五)《于阗教法史》(*Li-yul-chos-kyi lo-rgyus*)^⑤。

关于这些文献,早在1884年,柔克义(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1854-1914)在他的《佛陀传》一书中就发表了部分翻译^⑥。1921年,寺本婉雅(1872-1940)又部分翻译成日文(一)(三)^⑦。后来,托玛斯(Frederick William Thomas 1867-1950)系统地翻译了这些文献^⑧。恩默瑞克感到把(一)重新翻译的必要,他新的工作成果于1967年出版^⑨。如今学术界一般依靠

① *TLTD I*, 89-136(英译); *TTK*, 1-77(转写和英译)。参看 Rockhill, *op. cit.*; 寺本《于阗国史》, 1-50页; 则武海源《于阗国悬记(Liyul lung bstan pa bzhungs so)翻译研究》, 作者《西チベット佛教史·佛教文化研究》, 山喜房佛书林, 2004年, 467-481页。敦煌藏经洞发现的《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之记》(P. ch. 2139; 《大正藏》五一, 996页, No2090), 是法成把藏文 *Li yul lun-bstan-pa* 的开头部分翻译成汉文的。关于此卷和法成, 见 P. Pelliot, "Notes à propos d'un catalogue du Kanjur", *JA* 1914, 142-143; 羽田亨《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之记解说》(原载《史林》第8卷第1号, 1922年); 同作者《书后》(原载《支那学》第3卷第5号, 1923年); 二文都收入《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》下卷, 图版九, 358-359, 360-364页; 谏访义让《〈于阗国悬记〉汉译考》, 《支那佛教史学》第1卷第4号, 1937年, 79-88页; 清水亮昇《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之记について》, 《密教论丛》第12号, 1937年, 101-126页; 上山大峻《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の研究》, 原载《东方学报》(京都)第38册, 1967年; 第39册, 1968年; 收入作者《敦煌佛教の研究》, 法藏馆, 1990年, 84-246页。此写卷在灭法思想的传播上的意义极大。

② *TLTD I*, 1-38(解说和英译)。

③ *TLTD I*, 39-69(解说和英译)。又见寺本《于阗国史》, 51-65页; R. E. Emmerick, "Notes on the Prophecy of the Arhat Samghavardhana", *AM* ns. XIV. 1, 1968, 96-100。

④ *TLTD I*, 77-87(解说和英译)。

⑤ P. t. 960 (earlier no. 254): M. Lalou, *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Touen-houang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* II, 1950, 25; *TLTD I*, 303-323(英译); *TTK*, 78-91(转写); 王尧、陈践《于阗教法史——敦煌古藏文写卷 P. T960 译解》, 原载《西北史地》1982年第3期; 收入作者《敦煌吐蕃文献选》, 四川民族出版社, 1983年, 140-159页。

⑥ W. W. Rockhill, *The Life of the Buddha and the Early History of his Order*, London 1884, Chap. III: The Early History of Li-yul (Khoten), 230-248。

⑦ 寺本婉雅《于阗国史》, 丁字屋书店, 1921年。应当说明的是, 译者对藏文版本的认识似有混乱, 见“研究文献目录”中的县隐(=石滨纯太郎)的书评等。

⑧ 有上面(一)(二)(三)(四)的文献, 见 *TLTD I*, "3. The Prophecy of the Li Country, including the Annals of the Li Country", 71-136, "Appendix: The Religious Annals of the Li Country", 303-323。

⑨ *TTK*, 也包括(四)的转写。恩默瑞克参考贝利的研究(H. W. Bailey, "Irano-Indica III", *BSOAS* XIII. 2, 1950, 392), 把 *Li yul lun-bstan-pa* 译成 "Prophecy of the Li Country"。另外, 关于藏文的版本, 参见对此书的一些书评(见研究文献目录)和 J. E. Hill, "Notes on the Dating of Khotanese History", *IJ* 31:3, 1988, 186 n. 1。

恩默瑞克和托玛斯的工作成果。

这些藏文著作原本就是用藏文编纂而成的,还是从于阗文转译而来的?迄今没有定论。但鉴于藏文《大藏经》所收绝大部分著作是译经,认为这些书为于阗文的译本也有一定的理由^①,尤其是藏文文献中使用了许多于阗的名称和术语,这表明其原典为于阗文,至少由能够直接利用于阗文材料的人翻译成藏文^②。这些藏文文献,作为研究于阗史的珍贵史料,尤其是研究于阗王统时不可缺少。柔克义以来,中外许多学者参加这个讨论,大大地推动这方面的研究。这些重要的研究成果,当然有助于研究于阗佛教史的问题。不过,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都集中于阗晚期的王统,而于阗佛教最繁荣的时期之前的王名的绝对年代,现在无法考订。

3. 敦煌文书

敦煌莫高窟第17窟发现的“敦煌文书”应当是属于出土文献,但其中有一些和上面的汉藏文史籍相同或相类似的文献,如汉文的《慧超往五天竺国传》,藏文的《于阗国教法史》等,所以也可以把这类材料作为传统文献来看待。至于其中包括的许多于阗语文书和相关文书,对于研究古代于阗的历史有很大的帮助,则可以与和田地区发现的于阗语文献同等看待。这批文书最有可能是三界寺的藏书^③,所属年代比和田地区出土的写本要晚。应当说明的是,本文利用敦煌文书只是一部分,而并不是全面的。

① 参看巴桑旺堆《藏文文献中的若干于阗史料》,69页。

② See F. W. Thomas, “The Language of Ancient Khotan”, *AM* II, 1925, 254–255; *KT IV*, 2; *TTK*, xi–xii; Hill, *op. cit.*, 191.

③ 参见荣新江《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》,原载《敦煌吐鲁番研究》第2卷,1997年;收入作者《辨伪与存真——敦煌学论文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0年,1–27页;同作者《再论敦煌藏经洞是宝藏——三界寺与藏经洞》,收入作者《敦煌学新论》,甘肃教育出版社,2002年,8–28页。同样看法,参见 L. Chandra, “Tun-huang as Power and Virtue”, *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* 55: 1–3, 2002, 89–98.

三、和田出土佛经写本

1. 考古发现经过与所在地概观

我们在讨论和田地区出土的佛教写本、世俗文书与考古材料的时候，往往感到繁琐，因为 19 世纪末以来来到和田地区的外国人的行迹、他们拿走的文物与写本的下落、有关论文的刊载等情况，都错综复杂。

关于整个新疆的探险史，最系统的概述有达布斯(Jack A. Dabbs)《新疆探险史》一书^①。近年的著作则有贾建飞《文明之劫》^②。此外，荣新江《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》(简称《知见录》)一书甚便利用：它按作者亲自访问的收藏机构来分别叙述文书的来源等问题，并不仅限于敦煌吐鲁番文献，也有关于海外所藏的和田出土文书的许多新见解。专门概述和田探险史的则有张广达、荣新江合写的《和田、敦煌发现的中古于阗史料概述》一文^③，以及杨镰《荒漠独行》^④中的相关论述。近年来，有关西域探险家的个人传记也陆续出版，如《走进中国西部的探险家》系列丛书(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，2002 年)。

随着相关信息的日益丰富，编辑一个去粗取精、疏通便览、易于利用的“简明学术手册”就尤显必要了。下面，即按照时间顺序整理来到和田地区的探险队的行迹、报告及携走文物的下落，为此项工作略作准备。其中得益于《知见录》者甚多，为实用计，故不辞叠床架屋之嫌。

^① J. Dabbs, *History of the Discovery and Explorations of Chinese Turkestan* (Central Asiatic Studies 8), The Hague 1963.

^② 贾建飞《文明之劫——近代中国西北文物的外流》，人民美术出版社，2004 年。

^③ 张广达、荣新江《和田、敦煌发现的中古于阗史料概述》，《新疆社会科学》1983 年第 4 期；收入作者《于阗史丛考(增订本)》，1-14 页。

^④ 杨镰《荒漠独行——西域探险考察热点寻迹》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，1995 年。

1890年3月初,英军中尉鲍威尔(Hamilton Bower 1858-1940)在庫车附近获得写在桦树皮上的一些梵文写本,一般称之为“鲍威尔写本(Bower Manuscript)”,实际上这些是《大孔雀明王经》等7种写本,霍恩雷(August Friedrich Rudolf Hoernle 1841-1918)认为这些是4世纪下半抄写的^①。这些出土于中国西域的写本的发现和研究,给当时的西方学术界以极大的震动,并由此揭开了各个国家西域探险的历史序幕^②。

和田出土文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俄国驻喀什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(Nikolaj Fedorovič Petrovskij 1837-1908)。用奥登堡的话来说,彼得罗夫斯基是提醒学者积极地注意到中国西域文物的第一人^③。关于所谓彼得罗夫斯基收藏品(Petrovsky Collection)来历的始末^④,邦嘎尔-列文(G. M. Bongard-Levin)和沃罗比耶娃-捷夏托夫斯卡娅(M. I. Vorobyova-Desyatovskaya)两位合写的《中亚发现的印度语文献(列宁格勒收藏品)》一书中有简要的描述,此书是了解他的收藏品最为方便的英文概述^⑤。据此,1880年代,彼得罗夫斯基已经开始收集中亚的写本和文物。在总共582项的文献资料当中,梵文写本计有251件,于阗文佛教文献有59件,世俗文书有238件^⑥。佛教学者奥登堡(Sergej Fedorovič Ol'denburg 1863-

① *The Bower Manuscript*, 3 parts, Calcutta 1893-1912.

② 参见王冀青《库车文书的发现与英国大规模搜集中亚文物的开始》,《敦煌学辑刊》1991年第2期,64-73页;《知见录》,1-2页。顺便说一下,关于这个历史性的发现,霍恩雷写给当时孟加拉亚洲学会的会长J. Waterhouse,这件信,现保管于大谷大学。据说,这是泉芳璫(1884-1947)于1920年在剑桥的古书店购买霍恩雷文库而来的。见泉芳璫《西域发掘的梵语古经典——へルンレ文库を回顾して》,《佛教研究》第3卷第4号,1922年,113-124页。

③ С. Ф. Ольденбург, “Памяти Николая Федоровича Петровского. 1837 - 1908”, ЗВОРАО XX. 4 (1910), 1912, 8.

④ 此收藏品的概述,还有:G. M. Bongard-Levin, “Buddhist Studies in the USSR and New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Soviet Central Asia”, *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* 12:1-4, 1973, 11-28; idem, “New Sanskrit and Prakrit Texts from Central Asia”, *IT* III-IV (1975-1976), Torino, 73-80.

⑤ G. M. Bongard-Levin & M. I. Vorobyova-Desyatovskaya, *Indian Texts from Central Asia (Leningrad Manuscript Collection)*, Tokyo 1986. 这篇小册子实际上是BB 33, 14-36的英译,后附按照每个写本的研究文献,作为极为方便的对照索引。

⑥ M. I. Vorobyova-Desyatovskaya, “The Leningrad Collection of the Sakish Business Documents and the Problem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Central Asian Texts”, *Turfan and Tun-huang. The Texts, Encounter of Civilizations on the Silk Route*, ed. A. Cadonna, Firenze 1992, 85-92.

1934)对该收集品的贡献不可忽略,他在亲自研究出土写本的同时,还推动了学界的进一步收集和整理。他在《(帝)俄考古学会东方部纪要》上断断续续地发表彼得罗夫斯基收集的写本^①,他还发表一叶写在桦树皮上的犍陀罗语《法句经》^②。

这些文章和彼得罗夫斯基本身的文章,可以算是研究该收集品的来历时的原始资料^③。这批资料由杰出的语言学者沃罗比耶夫-捷夏托夫斯基(Vladimiv Svjatoslavovič Vorob'ev-Desjatovskij 1927-1956)做了初步的研究^④,他先发表有关所谓《赞巴斯塔书》的研究等^⑤。

1890年,法国海军退役军官杜特雷依·德·兰斯(Jules Léon Dutreuil de Rhins 1846-1894)所组织的考察队到和田考察,他们沿途测绘地图,收集古代文书和古物。后经尼雅(今民丰)入藏。1894年德·兰斯等被杀于西藏,考察队员之一费·格伦纳(Joseph Ferdinand Grenard 1866-?)死里逃生,回到法国,1897-1898年出版了《特雷依·德·兰斯——亚洲高地科学考察报告(1890-1895)》^⑥。他们于1892年所获的佉卢文写本就是犍陀罗

① С. Ф. Ольденбург, “Кашгарская рукопись Н. Ф. Петровского”, ЗВОРАО VII (1892), 1893, 81-82, 2 л. табл.; idem, “Отрывки кашгарских санскритских рукописей из собрания Н. Ф. Петровского, I-III”, ЗВОРАО VIII. 1-2 (1893), 1894, 47-67; ЗВОРАО XI (1897-1898), 1899, 207-264, 2 л. табл.; ЗВОРАО XV. 4 (1902-1903), 1904, 0113-0122, 3 л. табл.; idem, “К кашгарским буддийским текстам”, ЗВОРАО VIII. 1-2 (1893), 1894, 151-153; idem, “Еще по поводу кашгар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текстов”, ЗВОРАО VIII. 3-4 (1893-1894), 1894, 349-351. 这些文章都收入 *Buddhist Texts from Kashgar and Nepal*, by I. P. Minayeff & S. Oldenburg, New Delhi 1983, 154-258.

② Idem,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ая заметка о буддийской рукописи, написанной письменами Kharoṣṭhī, Санкт-Петербург 1897; also in: *Buddhist Texts from Kashgar and Nepal*, 259-267.

③ 彼得罗夫斯基文章也发表于《(帝)俄考古学会东方部纪要》(= ЗВОРАО)上。另外,关于他收集的爱尔米塔什美术馆所藏的文物材料,他的一封信说明这些文物主要是从 Borazan 村即约特干(Yotkan)遗址获得的。

④ 参见 Г. М. Бонгард-Левин и Э. Н. Тёмкин, “Работы В. С. Воробьева-Десятовского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буддийских текстов из коллекции Н. Ф. Петровского”, *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и языков и культуры народов Индии*, Москва 1974, 12-19.

⑤ В. С. Воробьев-Десятовский, “Памятники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”, *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* XVI, 1958, 280-308. 很可惜的是,他不到30岁就夭折了。

⑥ F. Grenard, J.-L. Dutreuil de Rhins, *Mission scientifique dans la Haute Asie 1890-1895*, Paris 1897-1898. 参见杨镰《法国杜特雷依探险队遗踪纪实》,马大正等编《西域考察与研究》,新疆人民出版社,1994年,59-79页。